

绪 论

一、自然史、文明史、思想史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历史当然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正如一切物种都有它们的自然史一样，人类也有其自身的自然史。但是人类的自然史只是人类的史前史。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这是人类历史有别于其他一切物种历史的特征所在。一切其他物种的历史都仅仅是自然史，惟有人类在其自然史的阶段之后，继之以他们的文明史。文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也可以说，文明史是自然史的一种外化。一旦人类的历史由自然史外化为文明史，它就在如下的意义上对自然史宣告独立：那就是说，它不再仅仅表现为是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历史，同时它还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文动机的历史。人文动机一词是指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辨、计较、考虑、推理、猜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等，总之，是人类

的思想，是为人类所独有而为其他物种所没有的思想——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事业，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有和其他物种一样的单纯的自然史。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历史。都是由于人类有了思想活动的缘故，人类才有了文明史。在这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的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及其表现为行动的历史。

思想一旦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它就赋予历史以生命和生机，于是就有了文明史。思想是使人这个物种有别于其他物种的要素。或者说，人是一种能思想和有思想的动物。而思想之所以能够创造文明，其奥秘就在于思想是可以积累的。其他的物种都没有思想的积累，所以每一代都只能是简单地重复他们前一代的活动，那只是自然的或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惟其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人的知识才是可以积累的，每一代人才有可能利用此前一切文明的成果，所以人类文明就有了不断的进步。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所以每一代人都比前人来得更加高明（或者更为恶劣）。自然史本身虽然也各有变化，但是并没有进步之可言。因为是有了思想，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而且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创新。

思想之表现为文明史，可以是在物质方面，也可以是在精神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综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这个整体就成其为人类的文明史。所以历史学不能单纯考虑物质方面，也不能单纯考虑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综合为

一个整体；思想史则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至于物质与精神双方的相互渗透、交融和影响，我们将在下文中阐述。

二、思想史、专史、思潮史

历史（当然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是人类有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思想史就是通史而不是专门史。专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的某一个专门的方面，如数学史、音乐史等等。通史研究则是把人类有思想的活动（没有思想的活动便是自然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思想当然是一定历史现实的反映，没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基础，也就不会有某种特定的思想。但是反过来，现实历史也是思想的体现，没有某种特定的思想，也就不会有某种特定的历史现实。就本书所要论及的近代社会思潮而言，牛顿和瓦特或卢梭和亚当·斯密，固然他们的思想都是近代西方历史的反映，但是反过来，他们的思想对于推动近代西方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没有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没有近代科学，没有瓦特的蒸汽机就没有近代的工业革命，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就不会爆发法国大革命。驱动人们去创造历史的乃是人的思想。历史（人类文明史）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创造的结果。

但是，作为通史研究中轴线的思想史研究占有了其在历史学中应有的位置，却是很晚的事。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在我国正式确立要从侯外庐先生有关中国思想通史的系列著作算起。至于有关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二三十年

代之交，曾有 Merg 的《十九世纪思想史》的中译本问世，此后就几乎成为绝响，再也无人问津，既没有史册专著，也没有译著。本书最后部分所附参考书目中的一些西方流行的著作，也都不见有中译本行世。不过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专史，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思想史互相重叠，乃至有日益趋同与混一之势。哲学史是专史。专史是从专业的角度考察问题，带有很强的技术性，它首先考虑的是哲学问题（正如数学史所考虑的是数学问题），它并不考察人（作为历史的主人）的全部思想脉络。它是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回答专业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从人类整体的发展脉络上解说人类的思想史。当然，专史也要结合历史背景加以考察，但它所考察的对象并不是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为专业本身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例如，修筑河堤需要多少土方，这在数学上是一个三次方程的问题，它诱发了人们对三次方程的研究和解答。数学史家所着眼的只是它如何解决了三次方程，他研究的不是河工工程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家们是不谈世界观的问题的，因为世界观是圣书里面早已经给定好了的，神学家们已再没有置喙的余地。神学家们的工作只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论证或阐发它是如何如何正确而已。这就是专史和思想史的区别所在。哲学史只研究哲学观念与问题的演变，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等）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思想与现实综合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的历史整体。读者必须联系到历史现实才能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又必须联系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该时代的

历史真髓。

专史所考察的专业问题，其本身具有独立于历史现状之外的价值，那是不以历史现实条件为转移的。例如，欧几里德几何或阿几米德原理，它们虽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其一旦诞生就向产生了它们的母体宣告独立，它们的价值就只存在于它们本身，而与产生它们的历史现实无关。我们今天仍然学习它们并且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科学史的人来说，并没有必要深入理解它们和古希腊史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家也仅仅考虑它们对于科学本身发展的贡献和价值。思想史的研究则不然，它不仅要考虑观念本身的价值，而且要考虑各种观念具体的历史内涵和意义。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网络或语境去研究它们，那么我们对它们就只会停留在字面的认识上，而不能达到真正历史意义上的认识。例如，历史学家在解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或则强调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生活的困苦，或则强调启蒙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启发。实际上，历史总是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体。人民生活优裕固然不至于爆发革命，但是缺乏启蒙的觉悟，安于自己思想之被奴役的蒙昧状态，也难于爆发革命。即以法国大革命而论，难道当时与法国近邻的德国人民或西班牙人民，其物质生活水平就高于法国的吗？为什么恰好革命是在法国而不是在德国或西班牙爆发呢？酝酿了几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启蒙哲学，不能不说是一剂强而有力的催化剂。综观古往今来的史乘，革命并非总是在生活最贫困的时刻和地点爆发。这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所要研究的课题，但它不是专史的课题。专史不能代替思想史，正如思想史不能代替专史一

样。

思想史所论述的是人们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广泛意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前所述，这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所在。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也就是历史）都是有思想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历史抽掉了思想，就不成其为历史。单纯的自然史并不是历史，即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即人文史或人类文明的历史）。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类的历史是贯穿着人的思想活动的历史。正因为思想史的这种特性，所以它不是任何专史，如哲学史或数学史等等。哲学或数学当然也是思想，所以也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是思想却并不必须采取哲学的或数学（或其他任何专业）的思维方式。古希腊谚语说：上帝以几何规范了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必然符合几何学的规则，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用几何学的规则或者万有引力定律或其他任何规律来解说历史，因为历史毕竟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有思想、有意识的创造物。贯穿着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的的是人的思想的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史。

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活动，总会表现为诸多方面，但在许多方面之中我们又往往发现有某种或某些总的趋势或倾向，可以称之为潮流或主流。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思潮，或者大致上就相当于德国史学家所喜欢用的 *zeitgeist*（时代精神）一词。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许多次巨大的历史动荡或变革，每一次都可以说有一股强而有力的思潮或时代精神荡漾其间。这种现象，古人也称之为气数转移，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率先登高一呼，他们的呼声响应了时代的要求，于是数十百

万人就风起云涌，汇为巨流，思想也就由学术圈子扩大为一个时代的潮流。从专业的技术角度而言，有些可能谈不到什么哲学；但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属于同一个思潮的，不仅有观点和见解相同的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貌似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却都属于同一个思想潮流的不同侧面，这倒更会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一个时代思潮的真正所在。例如，在一个极其动荡的时刻，往往会同时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激进，要砸烂一切，从头开始；一种是极端保守，要维护一切现状于万世不变。其实，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否认现状有任何可能改善或进步的绝望心态，结果双方都是要复古，要把一切推回到原点上去。他们都不相信人类的思想文化是积累的。

三、思想史，积累的和非积累的

人类的思想文化不妨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积累的，一类是非积累的。科学技术是一代一代层层积累的，愈积累就愈丰富，也愈高明。这一点在历史上是灼然可见的。没有17世纪的经典物理学，就没有18、19世纪在它那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分析学派，而没有18、19世纪的分析学派的结果和贡献，就没有尔后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但是，历史中的人文成分是积累的呢，还是非积累的呢？后人的道德、伦理、情操和心灵境界，是不是也由于代代积累而一代胜似一代呢？对这个问题似乎不如前一个问题那么容易地给出答案了。

属于人文范围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知识性的和技术性的，一类是涉及非知识性的和非技术性的。前一类是可以积累的，后一类则否。属于后一类的是个性的创造、个人思想与风格、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与心灵境界，这些是不能继承的，所以是无法积累的。它对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从头开始，薪尽则火熄，是不可能传给后世的。例如，在艺术和哲学中就都包括有这两类成分。没有巴哈、莫扎特，就没有贝多芬，没有贝多芬就没有 19 世纪古典音乐的一系列大师。他们有许多知识性和技术性的东西是代代积累的，但是他们每个人的人格、品性和思想境界却是完全个性化的而又各不相同的，在这方面没有积累和继承的问题。再如，在哲学上，没有经验派和理性派，也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但是，当时的每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又是完全个性化的和各不相同的。就思想文化的积累和继承而言，砸烂和抛弃一切已有的成果，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在感情上则是虚无与绝望心态的表现。假如借用当今的一个流行术语，抱有这种情怀的人不妨称之为思想上的“旁客”（intellectual punk）^①。只有对人类的历史文化因而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丧失了信心的人，才会沦为思想上的“旁客”。他们既不接受人类历史文化的滋养，也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属于垮了的一代。事实上，所有形形色色的独断论者、原教旨主义者或惟我独尊论者，均可以作如是观。他们一点也不比他们所要打倒的对象更加仁慈，更为无害。

这种“旁客”往往是五颜六色、装饰怪异的青年们，百无聊赖地麇集在街头。他们是思想上垮了的一代。

这种虚无思想的发展，结果只能是使人类文化倒退到文明史以前的蒙昧状态。人类思想文化的前进只能是靠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而绝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彻底砸烂。谈到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则应该是怎样珍惜和运用这份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承认，属于人文范围的既有积累的部分，也还有非积累的或不可积累的部分。这后一部分大抵涉及人们的价值观、道德取向和人生境界。它们之间的高下和优劣，往往难以进行比较，有时候甚至是根本无法比较的。诗人陶渊明曾着力描写了一幅桃花源的生活图景，把它美化为自己的理想国。那里的人们竟然纯朴（或愚昧）得“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哲学家康德却不赞成这样的理想国，他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一种阿卡狄亚式（Arcadia，亦即桃花源式）的生活，只能使人安于怠惰，无所作为，所以无法激发人们天赋才智的充分发展，因而就是不可取的。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国，究竟哪一种更优越、更美好、更值得继承呢？以斗争和进取为乐的人大概愿意选择康德的那一种，而以淡泊和宁静为高的人大概愿意选择陶渊明的哪一种。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类事例来表明，在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上是无法进行比较和评价的。

就可积累的文化而言，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毫无疑义的。物质方面的如飞机、汽车、电讯、传媒等等，精神方面的如科学、哲学的许多研究以及种种艺术表现手段都是日新月异、为古人梦想所不能企及的。如果我们能从研读人类思想史中知道更多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思潮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虽然未必就能使我们更有智慧，但至少可以使我们

在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想面前更加谦虚、更少一点自以为是，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人类的进步应该不只是物质文明的进步，也还有精神文明的进步。然而，仿佛是近代物质文明进步的步伐太快了，精神文明似乎赶不上去，望尘莫及，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使得人们往往有惶惑、苦闷和莫知所从之感。

四、古代思想与近代思想

众所周知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古代，中国文明曾经在世界历史上居于领先地位，她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称为人类的四大古文明，再加上后起的希腊、罗马一起，代表着人类古文明的高峰。但是后来，其他的古文明，埃及的、巴比伦的、印度的、希腊—罗马的都告衰竭，或则是被吸收入别的文明，或则是从此光沉响绝。其间惟独中国的文明一直延续下来，不但迄未中断，而且还不断在发展，出现了尔后中世纪的汉唐盛世和宋代的灿烂文化。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堪称为一大奇迹。在此后漫长的中世纪，中国文明仍然在世界历史上遥遥领先于其他一切文明，其间也许只有阿拉伯文明差可望其项背，而此时的西欧则正处于所谓的“黑暗时代”。

然而，同样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比起西方来是落后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比西方晚了两个世纪，近代工业比西方晚了两个世纪，近代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大体上也要比西方晚两个世纪。西方的近代化过程要从 16 世纪算起，中国近代化的起步要迟至 19 世

纪末才正式开始。有人说，其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但也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在 16 世纪已经萌芽了。按马克思本人的论断，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在 15 世纪末已散见于地中海上的若干城市，到了 16 世纪的最初 30 年就已大规模发展起来。然则，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何以迟迟不能开花结果竟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当然，我们也可以反问，不开花结果的，究竟能不能算是萌芽？

我们先看中国何以以及怎样由先进而沦于落后的这一历史事实。世界通史的分期通常是三分法，即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代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文化，并非仅仅是时间上距离的远近而已。当近代的思想意识觉醒之后，人们自以为自己是启蒙了的，于是便把过去漫长的中世纪视之为愚昧和黑暗的代名词，他们转而从古典的古代去寻求某些文化传统，由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即近代。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别，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非但是指时间的远近，而尤其在于它们精神实质的不同。中国历史如果也想步入近代，她就必须要经历一番近代物质文明与近代思想意识的洗礼，这就是所谓“近代化”的内容。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现代化”一词，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步骤在内的，第一步是“近代化”，待到“近代化”已告完成之后，便是下一个阶段，即“现代化”。

一个社会的形态和性质是被其生产关系所制约着的，而生产关系又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的综合体中，即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永远是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而在生产力之中，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大体上，有什么样的科

学技术，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和思想体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首先就见之于科学技术。人类有了农业，就有了定居生活和传统社会；有了近代的科学和工业，就有了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近代史之所以稳固地占领了历史舞台，是和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分不开的，由此而形成了近代社会生活与近代精神面貌。近代社会有它自己一系列独特的、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思想意识。近代科学技术之高速度与加速度的发展，是古代、中世纪传统所无从梦想的，它那与之相应的政治社会 and 思想意识也是前人所未尝梦见的。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宇宙的无限性及其运动的规律、机械论、分析的方法、进化论、个人主义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人权论、人民主权论、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潮都是由近代化所产生的，而为传统社会所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近代化的产物，并不必然就是近代化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是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面前的难题。西方历史近代化过程所出现的一切事物，中国在她的近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必要全盘照搬，这样做不但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移植总有一个适应于本土的过程，那当然也就是一个改造西方舶来品的原装的过程。问题是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有许多西方的因素夹杂其间，那些因素并不是必然为其他民族的近代化所需要的。但是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又必然有许多近代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为一切民族的近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这后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层次上表现得特别鲜明。当然，某些社会体制和思想理论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后一方面就需要比较历史学进行深入的探索了。

以下本书将简略地回顾近代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的思潮。它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一定都是思想近代化过程的必要条件和内涵，而没有它们之中的某些就不成其为近代思想或近代化的思想或思想的近代化。我们应该仔细分辨其中哪些对于近代化是有普遍意义的，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哪些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西方所特有的，因而对近代化就并非是必要的。这里既需要有科学判断，也要有价值取舍。本书的作者们希望努力做到忠实于原思想面貌的介绍，而尽量不作价值判断。不过，人文学科的特点之一也许恰好就在于它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观贯彻始终而不可能做到像是自然科学那样纯客观的探讨。

五、近代世界和近代中国

人类的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所以总的说来总是后胜于前、今胜于昔的。这就保证了文明至少是在物质方面以及诸多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人类文明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当它积累到一定高度时，它就会突破传统而进入近代。尤其是当近代文明已由西欧一隅扩展到了世界范围时，应该承认这场扩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历史趋势，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就都被迫不得不也被纳入近代化的进程。这是一种不可阻挡而又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趋势。这场世界性的近代化历史进程应该从 15—16 世纪之交的西欧算起，而由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和宗教改革三者同时在改变历史面貌，即从传统步入近代的运动正式揭幕。对于这样一场历史

性的大变革，也许在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要数中国文化及其心态是最难以适应的了。因为大体上自从有文明史以来，中国文化不但始终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和其他传统的古文明不同，她从未死去而是始终绵延不断地在成长和发展。毫无疑问，几千年来，她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而且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直到 18 世纪，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中国方面仍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而视当时的英国——毫无疑问它那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为蛮夷之邦。

为什么在 15 世纪之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领先，而到了近代之后竟然发生了逆转呢？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所致。然则，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或者发达不起来呢？据说是受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缘故。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就突不破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呢？按理说，先进的生产力是完全应该而且有能力突破落后的生产关系的。这在理论上就陷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无论如何，从此以后在几百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不但在物质的层次上，也在思想的层次上。我们到 19 世纪，还在补 17 和 18 世纪的课；到 20 世纪还在补 19 世纪的课。直到 19 世纪中叶，我们才开始憬然于“船坚炮利”的“夷之长技”对中国也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随后才开始觉悟到不但是技术层次的东西，还有基础科学也是同样需要的，于是，引进了近代的声光化电和经典力学体系。到了 19 世纪末期，才又进一步认识到，在物质层面的后面，也还有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于是，提出了近代议会制的纲

领，要求变法维新。稍后又意识到，不仅有社会政治体制问题，而且还有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于是，20世纪初就呈现出大量宣扬西方思想理论的潮流，而到五四运动则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当时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其主要内容仍不出18世纪的人权论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一点，观乎当时所谓的国民教育纲领和科玄论战即可知。当然，无论如何，中国必须近代化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打倒孔家店”对于摆脱前近代的传统束缚是功不可没的。当然，砸烂一切旧传统同崇古与复古一样，是永远不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人类的进步需要的是不断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前进。人们不能脱离文化传统而生活，也不能固守于旧的文化传统。

六、近代化思想与现代化思想

一般说来，近代化进程最关键性的契机乃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本变化。但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副作用，即它使得人们力图把全部的人文生活都以科学为依归，无形中在18和19世纪先后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但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既包括有理性的成分，也包括有非理性的成分。理性主义者只看到并只承认理性的成分，而不承认其中非理性成分的合法与合理的地位，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态度。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必须承认非理性成分的合法与合理的地位。同样，真正的科学主义或科学态度，就必须承认人生中（例如在宗教信仰中或爱情中）某些非科学成分的合法地位，否

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理性或科学是人类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人类文明不仅不可能进步，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但它决不是惟一在起作用的因素。人类的文明史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或理性的一统天下。崇拜理性或科学过了头，就成为理性崇拜或科学崇拜，其结果就走入了和传统各色迷信一样的另一种迷信。事实上，自从 17 世纪近代思想和近代思潮在西方奠基以来，西方思潮就沿着两条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途径在开展：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思潮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由与他同时代的巴思迦（巴氏也是最卓越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所开创的“以心思维”的道路。在近代史上，17—19 世纪由于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及其深远的影响，似乎前者占了上风，科学似乎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一切似乎最后都要以科学为惟一的准则和依归。但是，后一条路线却也不绝如缕，直到 19 世纪末叶，科学发生了另一次革命，人们的观念又开始转变。在中世纪，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到了近代，情形似乎颠倒了过来，人们一切思想活动都应该成为科学的奴婢，都要以科学为其最高裁判官——这里面同样包含着对思想、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即要把人生的全部都置于科学的绝对权威之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权威只能是相对于一定的领域或范畴而言的。正是针对科学的这种绝对权威或者科学至上主义，从上个世纪末就在各个领域（甚至也在科学的领域）出现了抗议的声音，当代欧洲各派大陆哲学都可以视为它的代言人。

近代科学的腾飞同时也似乎加深了物质文明与人文价值的分裂。物质文明先进的西方，是不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有

异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呢？世界文明的近代化和一体化，是不是必然要排斥文化的多元论或多中心论呢？抑或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于是相辅相成的呢？假如近代化和一体化就意味着一致、同一和齐一，那么世界文化将会再没有一片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园地，思想和文化将会由于僵化而枯萎。整体的繁荣正有待于其中每一个成员、每一种文化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光辉。每一种文化乃至统一的世界文化，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交辉互映，彼此促进。秦代的思想专制、以吏为师，罗马帝国的皇权神化、定于一尊，都导致了文化的衰落，成为国家覆灭的前奏。反之，我们也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各种不同文化因素交辉互映的效应。假如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在西方就不可能有知识的下移，从而有可能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传播开来，成为揭开近代化的第一幕。印刷术、造纸术、罗盘针和火药并称为中国文明史上的四大发明。罗盘针的西传就为地理大发现准备了极其重要的技术条件；火药的西传则使市民阶级得以战胜中世纪封建领主们不可攻克的堡垒。从中国文明对于世界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出，各个民族、各种不同文化会怎样地丰富世界历史的整体。一花独放，不会永远都是春天。一是多的综合，不是多的消亡。一寓于多，多寓于一，五音齐奏，和而不同，才能奏出一曲扣人心弦的宏伟交响乐。

要把各个不同的文化综合为一个整体，就必须有一种思想上的凝聚力；当这种凝聚力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时，我们就称之为思潮。单纯靠专制主义所达成的一致是不会巩固和持久的，因为它缺乏内在的向心力，这类事例在古今中外